

中国艺术研究院 学术文库

恭王府文评

郑恩波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恭王府文评

郑恩波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恭王府文评 / 郑恩波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1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王文章主编)

ISBN 978-7-5699-0778-0

I. ①恭…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7597号

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

恭王府文评

著 者 | 郑恩波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杨红卫

项目统筹 | 余 玲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曾 丽

装帧设计 | 程 慧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0539-292588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9.5

字 数 | 449千字

版 次 |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778-0

定 价 | 7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王文章

以宏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考方式，通过学术探求，超越当代社会功利，承续传统人文精神，努力寻求新时代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想，是文化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正是以“推陈出新”学术使命的担当为己任，关注文化艺术发展实践，求真求实，尽可能地从揭示不同艺术门类的本体规律出发做深入的研究。正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的学术成果，才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曲折的发展历程中，经历聚散沉浮，但秉持学术自省、求真求实和理论创新的纯粹学术精神，是其一以贯之的主体性追求。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扎根中国艺术研究院这片学术沃土，以学术为立身之本，奉献出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美术史》、《中国舞蹈发展史》、《中国话剧通史》、《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建筑艺术史》、《美学概论》等新中国奠基性的艺术史论著作。及至近年来的《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电影发展史》、《中国近代戏曲史》、《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中华艺术通史》、《中国先进文化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丛书》等一大批学术专著，都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出版学术专著至少在千种以上，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

论文。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以自己的创造智慧，在时代的发展中，为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和学术发展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为检阅、展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概貌，我院特编选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丛书。入选作者均为我院在职的副研究员、研究员。虽然他（她）们只是我院包括离退休学者和青年学者在内众多的研究人员中的一部分，也只是每人一本专著或自选集入编，但从整体上看，丛书基本可以从学术精神上体现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自觉人文追求和学术探索的锐气，也体现了不同学者的独立研究个性和理论品格。他们的研究内容包括戏曲、音乐、美术、舞蹈、话剧、影视、摄影、建筑艺术、红学、艺术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学等，几乎涵盖了文化艺术的所有门类，学者们或以新的观念与方法，对各门类艺术史论作了新的揭示与概括，或着眼现实，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当前文化艺术发展趋向的敏锐观察与深刻洞见。丛书通过对我院近年来学术成果的检阅性、集中性展示，可以强烈感受到我院新时期以来的学术创新和学术探索，并看到我国艺术学理论前沿的许多重要成果，同时也可以代表性地勾勒出新世纪以来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及其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我国唯一的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艺术学术机构，始终以学术精进为己任，以推动我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繁荣为职责。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改变了单一的艺术研究体制，逐步形成了艺术研究、艺术创作、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全院同志共同努力，力求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在这样的发展格局中，我院的学术研究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基础性的艺术史论研究和对策性、实用性研究并行不悖。我们看到，在一大批个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我院正陆续出版的“中国艺术学大系”、“中国艺术学博导文库·中国艺术研究院卷”，正在编撰中的“中华文化观念通论”、“昆曲艺术大典”、“中国京剧大典”等一系列集体研究成果，不仅

展现出我院作为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的学术自觉，也充分体现出我院领军国内艺术学地位的应有学术贡献。这套“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文库”和拟编选的本套文库离退休著名学者著述部分，正是我院多年艺术学科建设和学术积累的一个集中性展示。

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几代学者积淀起一种自身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勇于理论创新，秉持学术自省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以贯之的纯粹学术精神。对此，我们既可以从我院老一辈著名学者如张庚、王朝闻、郭汉城、杨荫浏、冯其庸等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深切感受，也可以从我院更多的中青年学者中看到这一点。令人十分欣喜的一个现象是我院的学者们从不固步自封，不断着眼于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新问题，不断及时把握相关艺术领域发现的新史料、新文献，不断吸收借鉴学术演进的新观念、新方法，从而不断推出既带有学术群体共性，又体现学者在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研究方向上深度理论开掘的独特性。

在构建艺术研究、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基础上，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艺术家们，在中国画、油画、书法、篆刻、雕塑、陶艺、版画及当代艺术的创作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都以体现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在广阔的题材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及艺术探索的独创性等方面，都站在时代前沿的位置而起到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引领作用。无疑，我院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的活跃，以及近十多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方面的开创性，都为我院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鲜活的对象和更开阔的视域。而在我院的艺术教育方面，作为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首家艺术学一级学科单位，十多年来艺术教育长足发展，各专业在校学生已达近千人。教学不仅注重传授知识，注重培养学生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注重治学境界的养成及人文和思想道德的涵养。研究生院教学相长的好气氛，也进一步促进了我院学术研究思想的活跃。艺术创作、艺术与学术教育并行，三者交融中互为促进，不断向新的高度登攀。

在新的时期，中国艺术研究院将不断完善发展的思路和目标，继续

培养和汇聚中国一流的学者、艺术家队伍，不断深化改革，实施无漏洞管理和效益管理，努力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知识创新、学术创新和理论创新，尊重学者、艺术家的学术创新、艺术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艺术研究领域拿出更多科学的、具有独创性的、充满鲜活生命力和深刻概括力的研究成果；在艺术创作领域推出更多具有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具有时代标志性和代表性的精品力作；同时，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真正把中国艺术研究院办成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和促进我国艺术与学术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14年8月26日

序

刘润为

追溯起来，我与恩波同志的交往缘起于刘绍棠。早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一直没写入团申请，班主任老师在一次班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走“白专”道路，且举刘绍棠为例，说他就是个“白专”典型，只写小说不求思想进步，结果成了“右派”。应当说，老师的批评是符合我的思想实际的。那个时候的我，确实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不怎么要求进步。至于刘绍棠是怎么成为“右派”的，老师语焉不详，我自然更是稀里糊涂。时间到了1971年，公社推荐我去县里的五七学校学习。给我们讲授“形式逻辑”和“古诗词格律”的杨克田老师，恰恰是刘绍棠在潞河中学的同班同学。一天晚上因为停电，我们几个同学和杨老师聊天。谈到刘绍棠的《青枝绿叶》时，杨老师说：那是他在高一写的，叶圣陶把它选入了高二语文课本。到高二讲到这篇课文时，老师看了一眼坐在讲台下的刘绍棠说，我不讲了，刘绍棠，你来吧。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喜欢杨朔的散文，也喜欢刘绍棠那些质朴清新的短篇小说，尽管只是在小范围交流。1991年，我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因为约稿且经常一起参加研讨会，我和刘绍棠很快成了朋友。几次谈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郑恩波的评价最符合他的创作实际。

由此，我开始注意恩波同志。说来有幸，1993年春，在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成立大会上得与恩波同志相识，并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交往。可以说，恩波同志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不仅研究刘绍棠及其他当代作家作

品，也介绍和研究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作家作品，而且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既得益于他从少年时代对于文学的爱好，也得益于他所受到的高等教育。

恩波同志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曾两次由公派赴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留学。第一次留阿回国后，经周总理提议和批准，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翻译，期间以笔名“红山鹰”发表“阿尔巴尼亚通讯”数十篇，在中、阿两国都颇有影响。第二次留南回国后，一直从事阿、南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先后出版《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当代文学史》《南斯拉夫戏剧史》等著作，翻译出版《亡军的将领》、《居辽同志兴衰记》《沼泽庄》三部曲和《母亲阿尔巴尼亚》等阿、南文学名著12部，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阿、南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现任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库依蒂姆·扎尼在为恩波同志译著所写的序言中说：“毫无疑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了解阿尔巴尼亚语言与文学最好的翻译。”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10年前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专门举行仪式，宣布他为该协会的唯一外籍荣誉会员。1992年，恩波同志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期间先后出版《大运河之子刘绍棠》《刘绍棠全传》等著作，主编《新时期文艺主潮论》（该书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还应各种报刊之约撰写文学艺术评论200多篇。这本《恭王府文评》所收入的，只是这些文章的五分之一。

读恩波同志文而观其为人，我有三种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个勤奋的人。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另一位曾在阿尔巴尼亚工作的学者写文章，叙述他当年如何和地拉那的美女泡时光、磨嘴皮。反观恩波同志，其生活则显得极为枯燥。无论是在阿尔巴尼亚还是在南斯拉夫，他除完成本职工作以外，其他时间都用到阿、南文学译介和研究上，几乎没有有什么个人爱好或情调。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期间，一有科研项目，他不但要负责协调和管理，还要投入其间，亲自动手写作。如前面提到的《新时期文艺主潮论》，他不仅是主编，还是不少章节的撰写者。退

休以后，亦是笔耕不辍至今。“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假托弟子评价自己的这两句话，移赠给恩波同志是非常贴切的。唯其勤奋，他才有成就，才有健康的体格，才有蓬勃进取的精神状态，才永远保持思维的旺盛活力。

这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是什么？就是对某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无论它是以理论、信条还是偶像形式出现的）的确认、恪守和践行。它是经过思考、怀疑、批判等审视生命的过程，在挣脱本能、欲望的羁绊之后对生命意义的一种确认。苏格拉底说得好：“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可见信仰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更是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根本。即使是那些信仰错了的人，只要他一以贯之，我们可以不赞成他的信仰，但对他们的操守却不能不表示尊重。最可怕的是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可以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指鹿为马、纵横捭阖，东食西宿、寡廉鲜耻，对任何社会、任何群体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比如我们的那些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有当年朝圣山学社那般对新自由主义的信仰吗？根本没有，他们什么也不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吃香时，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左”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吃香时，他们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新自由主义的一贯信奉者。今春见西方某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学者，谈起我国的这些“宝贝”及其他“公知”。这位学者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支持、利用他们，骨子里却看不起他们，说他们是“一些过于看重物质利益的人”。恩波同志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信仰这个呢？既不是因为像教徒那样去寻求心灵上的慰藉和解脱，也不是像铁杆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那样出于垄断资本集团的狭隘和偏见，而是为了活得明白、为了劳动大众以至全人类的幸福。因此我们说，这是具有真实性的信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信仰。信仰贵在坚持，贵在毫不动摇、始终不渝。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恩波同志文学研究的高峰期，也是马克思主义遇到严峻挑战的时期。那个时候的文坛，时髦的是新思潮、新花样，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谁就是不入流，就是保守僵化，就是极“左”分子，就是被孤立、被

嘲笑的对象。但是恩波同志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平心静气地去研读马克思主义，心无旁骛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文艺观来研究各个课题，而不管别人怎么说。那份淡定，就是信仰的力量，真实信仰的力量！

这是一个朴实的人。朴实是真诚、是智慧、是强大、是自信，是做人的大境界。也正因为如此，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尤其是人文界的知识分子。2000年我们去南斯拉夫访问，途经巴黎逛香榭丽舍大街，天空忽然掉下几个雨点，一位也在南斯拉夫留过学的同志大发感慨：“啊！巴黎的雨好浪漫哟！”其矫情之状令同行忍俊不禁。与这位同志相比，恩波同志的外语水平、国外阅历不知要胜出多少倍，但是他从来不卖弄、不矫情、不媚俗、不作伪、不诡行，本色得依然像他家乡东北的农民。恩波同志为人为文也是如此。他的文章总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语言平实、不饰辞藻，言之有物、不尚空谈，读之如对青山、绿水、白云，一切出于天然。这对于那种以故作高深荼毒读者的学术贵族主义文风，对于那种以空话套话欺世的党八股文风，都是极好的教训。

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中说：素园“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我想，恩波同志也是这样的人。然而，正是这样默默劳作的人，才是支撑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

读恩波同志文稿，禁不住感慨难收，拉拉杂杂写下这些话而不事推敲。唯愿恩波同志身体更加康健，有更多的好文章出世！

是为序。

2015年7月23日

作者系《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现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自序：为了报答周总理的恩情与期望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历史老人的巧安排，亚得里亚海岸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成了与我们最要好的兄弟友邦。随着中阿友谊迅猛蓬勃的发展，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了中央各部委非常紧缺的人才。

1969年8月，我完成了陪同中国专家在阿工作的任务回国以后，有5个中央部门抢着调我去工作，其中总参某部和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为调我争执起来，最后争到周总理那里，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报纸的国际宣传工作一直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报社国际部负责人戴枫同志讲，不要争了，最近一个时期，他在报纸国际版上经常读到署名“红山鹰”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文章写得不错，看来作者是懂阿尔巴尼亚文的，为了加强报纸对阿尔巴尼亚的宣传，国际部是否可以考虑调这个“红山鹰”到报社工作？戴枫同志告诉周总理，“红山鹰”正是他们要调的郑恩波。周总理高兴地说，噢，是这样，那样的话，郑恩波还是到报社国际部工作合适。于是，总参某部便把事先准备好的调用干部必备的材料主动地转交给了人民日报社。报社以“特事特办”的办法给周总理打了调人报告，总理很快地作了批复。这样，报社国际部便很顺利地从我所属的已经人事冻结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把我调到了人民日报社。9月16日，我满怀一个贫寒的车夫之子彻底翻身并当了国家主人的幸福感、荣誉感和非同一般的责任感、使命感，兴冲冲地走进王府井大街277号虽不很高但却显得异常神圣、庄严的人民日报社大楼，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的翻译、记者——以笔为武器的新闻战士。这件事乐得我几天合不拢嘴，我反复地想：一个刚到30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得到驰名中外的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武双全的一国总理周恩来的关注与重视，这不仅是我们郑氏家族多少代的莫大荣耀，而且也是故乡盖州乃至营口地区历史上头等大的喜事啊！

著名作家柳青在其代表作《创业史》里给我们留下了一句极富人生哲理的千古不朽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46年前，在周总理亲自关心下，我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就是我一一生中迈出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一步为我终生的事业定了位，铸就了我平生既从事新闻文学、文学翻译，又搞文艺评论的三栖文人的模样，并激励我为成为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文化行家拼搏不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周总理是塑造我这个文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综合形象的设计者；这一步也让我避开了不久在学部发生的那场至今想起来都还要心惊肉跳的群众陷害群众的大灾难。周总理是救我逃出灾难的大救星。

到报社工作不到10天，领导就叫我做好陪同即将来华访问的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工作。10月16日，周总理要接见代表团，我既高兴，又有些紧张，心里想：两周前，周总理批准我调到报社工作，现在马上又要我给他老人家当翻译，我也太有运气了。但是，一旦译不好，译的过程中打嗝呗儿，怎么办？我知道周总理的法文很好，可用法语与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交谈。阿文与法文比较接近，我怕有的词译不准，影响周总理的情绪和整个接见。而且，几天前周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这件事，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果总理谈话中涉及此事，政治术语更要译得准确、无误，不能出丁点儿差错。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更不安了。陪同代表团的国际部第一把手、资深记者戴枫同志见我有些信心不足，惴惴不安的样子，便很体贴地给我打气：“要有信心，保持平静、沉稳的心态。总理特别慈祥可亲，很体谅翻译。你大胆地译，就像在一般场合一样，没问题……”戴枫同志亲如兄长般的关心与鼓励，让我紧张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下午4点整，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不太大的会客厅里，周总理面带笑容，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亲切地与每一个人握手、问好。戴枫同志指着我告诉总理：“这就是我们刚刚调进报社的阿尔巴尼亚语翻译郑恩波同志。”周总理像长者对待孩子那样亲热地看了看我，握着我的手用力地摇了两下。我注意到总理握我的手比握其他中国同志的手都更用力。这一握蕴含着他老人家对后生晚辈无限的关爱、信任和厚望，我顿时感到太阳穴的血管怦怦地跳得好厉害，腿脚和双手变得轻飘飘的。当年，农民诗人王老九曾写下了“毛主席握了我的手，我心变黄金永不锈”的千古绝唱，而这会儿，王老九的这一绝唱恰好表达了我对周总理这一握的真切感受，心里反复地吟诵道：“周总理握了我的手，我心变黄金永不锈！”

周总理接见外宾的讲话，向来都是书面体的，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精彩的文章。那一天，他对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的讲话，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他主要是对自己不久前与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一事向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并通过他们向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交了个底。口气极为真诚、亲切，是只有对真正的同志和朋友才能讲的体己话。措辞言简意赅，概念清晰精确，我越译信心越足，越流利，主宾双方的脸上都露出会心、满意的微笑。此刻，我再也不感到紧张，呼吸也平稳下来。突然，总理转过脸来，和蔼可亲地问我：“最近，报刊上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新语录，就是‘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那一段，你会背了吗？”我难为情地回答总理：“还不会。”总理接着说：“这样吧，现在我一句句地说，你逐句译。”于是，总理便有板有眼、一字不差地把长长的一大段毛主席最新的语录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我也很准确地译了每一句，不重复，不打嗝呗儿。译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总理惊人的记忆力和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与忠诚。71岁的老人了，每天国家有多少大事、要事需要他老人家去过问、去处理啊！可他还能把毛主席最新的长长的语录背得如此熟练，实在是令人钦佩、敬仰！实在是古今中外难寻的天才总理啊！我心里由衷地感叹道，同时也为自己对毛主席著作学习得不好而深感愧疚。

接见结束了，周总理要和阿尔巴尼亚记者朋友们一起照相，按惯例，我和参加接待的同志们都自动地闪在一边。周总理一边向我们招手，一边说：“都过来，大家一起照嘛！”然后对外宾继续解释说，“翻译和接待的同志很辛苦。从前，他们只是忙忙碌碌地工作，照相从来没有他们的份儿。现在，我们就要改变过去的做法。”总理的这几句话是我没想到的，眼前的一切顿时变得更加绚丽多彩起来，我跟在戴枫和接待组的几个同志的后面，站到最后一排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第二天，这张对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的照片，便在《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这张照片是我一生中全部的照片中最珍贵、最富有光彩的一张！因为工作的关系，在此之前和以后，我有幸同中阿两国高层领导人和省（阿尔巴尼亚是区）市级高级官员、劳动模范以及战斗英雄照过许多像，但哪一位能像周总理这样享有如此高的世界性声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最富有人气呢？我认为，除了周总理之外，再无第二人。还有，“文革”期间，翻译参加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照相，我是第一人，在我之后才有王海容、唐闻生等译员的频频出场。这是我今生今世时时都要铭记在心的非常事件。它时刻提醒我：在人生与革命浩瀚迷漫的大海中，不管遇到怎样的难关与险阻，都要毫不动摇地沿着毛主席和周总理所指引的航道奋勇前进！

胜利地完成了周总理接见代表团的翻译任务，接待组的全体同志感到轻松了不少。晚上，戴枫同志与我聊了许多，这也是我调到报社后，他作为部领导与新人别具一格的谈心。“好不容易啊，这次我们调你来报社工作，惊动了总理，他老人家讲了话，不然你是调不来的。今后要好好干，可别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期望。我们国际部很幸运，多少年来，一直在总理直接领导、关怀下开展国际宣传工作。总理多次要求我们都成为自己负责的国家的研究专家，要精通一国或几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你很年轻，刚到30岁，要有信心，努力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

永远铭记周总理的恩情，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努力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这是我调到人民日报社特别是听了戴枫同志转达的周总理对从事国

际宣传的人员的要求和期望之后，在心里立下的誓言。

陪完了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之后，领导又要我做好陪同以解力夫和戴枫为领队的中国新闻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访问的准备。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中阿关系第一次遇到了小小的波折。特别重视中阿关系的周总理，为了确保我党政代表团和新闻代表团访阿圆满成功，于出访前夕在人民大会堂特别接见了两个团的全体成员，我有幸听到了周总理的教诲与嘱咐。他老人家对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纯真的友情和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成为指导我一生做好中阿文化交流工作的指导思想。4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对做好这一工作的决心与信心都毫不动摇。之所以如此，那是与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密不可分的。这辈子，是周总理那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的博大胸怀和对世界人民真切火炽的爱心主宰了我的灵魂。

那是阳光灿烂、前程似锦的大好之年，那是精力充沛、踌躇满志的而立之年，那是小鹰展翅，准备在辽阔的蓝天翱翔万里、大展宏图的兴旺之年。可是，有谁能想到，六月里竟然下了一场九月霜，正在红红火火向着宏伟的目标飞奔的红山鹰，突然挨了一闷棍，一夜间在有些人的心中竟然变成了面目可憎的黑乌鸦。

那是1970年5月4日，领导报社运动的几个头目找我，要我交代在学部外文所参加“×××”反革命组织反对周总理的罪行。真是荒唐可笑到了极点！一个把周总理看作比自己父亲还要亲的人，居然要参加“×××”反革命组织反对他老人家！难道我的良心被狗吃了？！真是岂有此理！我当然要据理辩驳，可是，那是毫无用途的，当天下午我就被停职反省靠边站了。

从这一天起，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天寒地冻、风雨飘摇，长达两年零70天的“非同志式的”苦难之旅便开始了。我不愿意用凄婉的文字、低沉的语调讲述自己如何硬着头皮当泥水匠砌墙、挖防空洞，也不愿意提及顶着暴风雪，从马厩里起粪出汗着凉得了迄今都没治好的风湿性游走式关节炎，更不想描述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吃喝拉撒睡在闷罐车厢里，与骡子、老母猪为伴，从河南驻马店火车站到北京丰台站度过的两天两夜，

因为我向来不喜欢更不使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类的文字。现在，还是让我以昂扬、激扬的笔调，向读者朋友诚挚地倾诉：几十年来，为了实现对周总理立下的“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通”的誓言，我都干了一些什么吧。

我心里明白，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不是来自领导报社运动的人，而是来自乱了套的学部。但我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千名秀才，决不会让中华最高学府（“翰林院”）永远无休止地乱下去。他们总有讲真话的一天，而一旦讲了真话，一切都会水落石出，到那时必然要还回红山鹰的真面目。但这需要时间，急躁一点用都没有。因此，我要马上静下来，聚精会神读书，搞翻译，一天也不能浪费，不然，把外语扔上一段时间，就会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丢掉。反正对我并没有实行隔离审查，只是叫我靠边站，那我就学做黄花鱼溜边学习好喽！在办公室里，有计划地细心阅读10多种阿文报刊并作笔记，多方面了解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回到单身汉宿舍里，便贪婪地阅读阿尔巴尼亚古今文学名著。平时如此，周末、节日里更是这样打发时间。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东单公园成了读书的好去处。到了河南叶县干校，在劳动休息的短暂时间里，我也在稻子堆下、柳树荫凉处、去县城办事走在宽宽的水渠边笔直的小道上读阿文诗和小说。到了京郊小汤山，我当了饲养员，在温榆河畔和马坊、大柳树村边放骡子时，我还经常放声高唱阿尔巴尼亚革命歌曲。就这样，在那孤寂难熬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把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以来的文学名著几乎全部通读了一遍。

我原来的估计很快地变成了现实。1972年初夏，在河南息县滚了两年泥巴的学部人，又回到北京，重新走进“翰林院”的大门。原来在残酷的逼、供、信重压下说了假话的人开始实话实说了。一天，领导报社运动的第二把手又找我，也叫我实话实说。不久，我便被从小汤山报社干校调回到国际部重操旧业。稍过一段时间，党组织生活也恢复了，并且重新出现在外事战线上。报社里一些在干校和我混得很熟的调皮的印刷厂工人互相逗趣：“开什么